

“有我们在，你不用怕”

——对话互助网站“淡蓝网”创始人耿乐

本报记者 姜燕



耿乐，“淡蓝网”创始人。自2007年开始，耿乐借助网站平台，开展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工作，数年间共服务目标群体十余万人次。2012年11月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与防治艾滋病民间组织代表座谈，耿乐也参与其中。

本版绘图 董春洁

民间男同性恋互助网站“淡蓝网”，拥有300万注册用户，这个数字使他们能够帮助国家决策部门对这个特殊群体进行研究，从而制订相应艾滋病防治措施。有数据显示，男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 and 吸毒是感染HIV

病毒的两个最主要途径。

然而，再有力的民间机构，在对HIV感染者施以援助时，也是无力的。必须靠全社会观念的改变，而这在当今中国，绝非一日之功。

同志酒吧里的淡蓝“快乐”检测

记者：作为一个知名的HIV感染者公益组织，你们有什么成功经验？

耿乐：我们较有特色的是，与政府机构合作HIV检测，为男同性恋者（下称“男同”）提供唾液检测。北京市共有3个检测点，分别在朝阳区的一家同志酒吧、淡蓝网在通州区的工作室和昌平区的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。淡蓝网的用户都知道这些检测点，“男同”之间口口相传是

“跟踪”阳性者，做到“零流失”

记者：明年准备扩张检测点吗？

耿乐：我们想要扩大检测的覆盖范围，但是，增加检测点数量并不是明年重点，提高对检测者的服务质量才是。

唾液的快速检测20分钟出结果，其间工作人员可对检测者做一些“同伴教育”，打消他的紧张情绪，亲切地询问为什么要来检测，是否有

为被劝退被劝辞者“危机干预”

记者：对于很多HIV感染者遭遇的各种社会歧视，你们提供援助吗？

耿乐：很多“男同”在感染HIV后，被学校劝退或被单位劝辞，我们也经常去做一些危机干预。

前段时间，有个在北京周边城市读大学的男孩来检查，被查出HIV呈阳性。男孩回校后，

怕拒诊隐瞒病情将是恶性循环

记者：感染者就医面对的歧视方面，近年有好转吗？

耿乐：医疗，还是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关注的问题，去年天津一起艾滋病患者求医被拒事件经媒体曝光，这个情况并没有太大改善，这种案例还时有发生，我个人感觉挺严重的。

前不久，北京专做感染者公益的“田园家园”实施了一起救助。一名外地感染者来北京一家很有名的医院做肿瘤手术，医生得知他是感

感染者逐渐能够自然谈论病情

记者：您接触的HIV感染者心理状况如何？

耿乐：今年我明显感觉许多感染者的心态变好。以前，感染者总觉得自己被社会遗弃，自卑、无助、低落，不敢让人知道，连感染者也找不到彼此的圈子。现在他们慢慢认识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。这些变化在微博上就能看出来。很多人坦然地写：“我‘小A’了，或‘A’了（A即HIV检测呈阳性了），还告诉大家哪天确诊，病毒载

不安全性行为致感染呈低龄化

记者：HIV感染者呈现什么样的新动向？

耿乐：近两年，感染者呈现出低龄化的倾向，在北京，十五六岁的感染者并不罕见。感染的途径都是不安全性行为，多年前，吸毒、输血或医疗事故是主要感染途径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做过一个调查，发现感染者呈现低龄化和高龄化两种倾向，高龄人群性生活得不到满足，出现感染，但这个人群的基数是小的。低龄人群则完全不同。

记者：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

耿乐：我必须重申，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疾病问题，而是一个社会问题。整个社会对这个特殊群体的接纳程度，与感染率等各种指标的变化

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。他们更愿意来我们的检测点，因为在公立医院检测要实名制。今年我们共为近3000人做了检测，最终阳性比例目前还不便透露，估计与去年持平。去年是3%—5%，这个比例不算高，北京属于低流行区，一些高发病区如云南和贵州去年达到10%左右。

记者：“男同”对检测点的选择有什么倾向吗？

耿乐：同志酒吧和我们工作室接待的检测

不安全的性行为，今后如何避免等。

此外，对检测结果呈阳性者的后续服务非常重要。多个检测机构发现，很多人一旦被查出HIV阳性后，便再也找不着了，我们管这种情况叫“流失”。他可能是害怕，担心被关起来、强制吃药、花钱治病、被通知家人或单位。

今年，我们成功做到“零流失率”，原因是采

将结果告诉一位他非常信任的老师。这位老师可能出于对学校负责的考虑报告校方。于是学校劝男孩退学，他走投无路向我们求助。我们给学校写信，又前去交涉，介绍艾滋病的传播途径，不要歧视感染者等知识性内容。学校比较通情达理，商谈后同意不劝退，但提出给他一间单

染者后想方设法拒绝。医院会找各种理由，如条件不够、治不了等。通常，若实在无法劝服医院为感染者手术，志愿者会帮助联系感染者定点的地坛医院和佑安医院，但它们毕竟是专科医院，很多手术做不了，还得去其他医院治疗。

劝说医院接诊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就是打攻坚战，不停打电话。“田园家园”的志愿者坚持每天给医院打一个电话，磨嘴皮子讲道理，直到最后医院决定给感染者实施手术。这个过程大概

量是多少，这个指标大家都知道，如果过低就说明有生命危险，高则表示健康，甚至达到一定程度身体里都检测不出这种病毒。

看到他们很自然地谈论病情，我特别开心。越来越多的年轻感染者变得阳光和积极，一起聚会、上网、打球等。以前，“男同”感染之后很自卑，觉得再也找不到男朋友了，现在环境要比以前好得多。有一种情况，我们叫“阴阳配”，就是

是联系在一起的。“男同”不为社会所接受，他们只能生活在“地下”，不能光明正大地谈恋爱，但他们有情感和生理需求，就去找一夜情，这非常危险。同时，学校关于艾滋病知识的教育匮乏，甚至有意回避。有一些防艾公益机构到外地找大学合作讲课，经常碰钉子，校方拒绝的理由往往是“我们学校没有同性恋，没人得艾滋病”等。这种说法虽然可笑，却是活生生的现实。

记者：您认为社会上对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有没有改变？

耿乐：改观不大。前一段时间，国务院法制办就商务部起草的《沐浴业管理办法》征求意见，办法拟规定，沐浴场所应在显著位置设立禁

者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要多得多，本质上是因为“男同”担心隐私或身份被泄漏。同时我们服务也很贴心，我们将同志酒吧的检测点取名叫“淡蓝快乐检测”，而不是“快速”检测，通过这个名字给“男同”一种暗示，即来检测是一件轻松快乐的事，它应该像一年两次的正常体检一样，不必紧张。工作人员都来自“男同”人群，佩戴蓝丝带，面带微笑，让前来的检测者感到十分亲切。

取了“谁检测，谁负责，跟踪到底”。当工作人员发现一个检测者是阳性后，不可转交给其他同事，因为这样会让感染者感觉很不好，觉得隐私这么快就被暴露给另外一个人。不仅如此，工作人员还要带检测者去疾控中心做确诊检测，让初筛感染者感到“有我们在，你不用怕”，帮助和支持他树立信心。

独的宿舍，但这会让其他同学对他更加另眼相待，觉得他是个怪物。最后，学校同意不对他特殊对待，只是要求他注意对自己和同学的保护。

沟通过程中，我们也会用一些“施压”手段，比如暗示“如果特别歧视，我们可能会求助媒体曝光”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做法。

持续了半个多月。

记者：医生拒诊带来什么负面作用？

耿乐：感染者的医疗，尤其是需要外科手术时，存在很大问题。有些感染者为了顺利就医，只好违心隐瞒病情，这就使医生暴露在危险之下。但如果坦白，又很容易被拒诊。这个矛盾只能通过不断宣传和观念改变才能消除。今年，感染者最关心的议题就是就医权、上学权、工作权等各方面权利的保障。

一个人感染了，一个人没感染，两人还是在在一起。这种也会让我很开心，只要他们在性行为上注意，还是能很好地避免。关键是两个人、特别是感染者有一种心理依靠。我的一个同事告诉我一个故事，有一对“男同”，一个很早就被确认感染，另一个最近也被查出阳性，如教育部门要增加这方面课程，民政部门对感染者采取危机干预，国家出台措施禁止就业歧视等。

我们也要看到，这种不理解很难消除，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。就连美国这样开放的社会，也用了几十年才使公众的意识有所改观。现在，一些国家和地区同性婚姻是合法的，每一个人都应知道怎样才能性行为中保护好自己。